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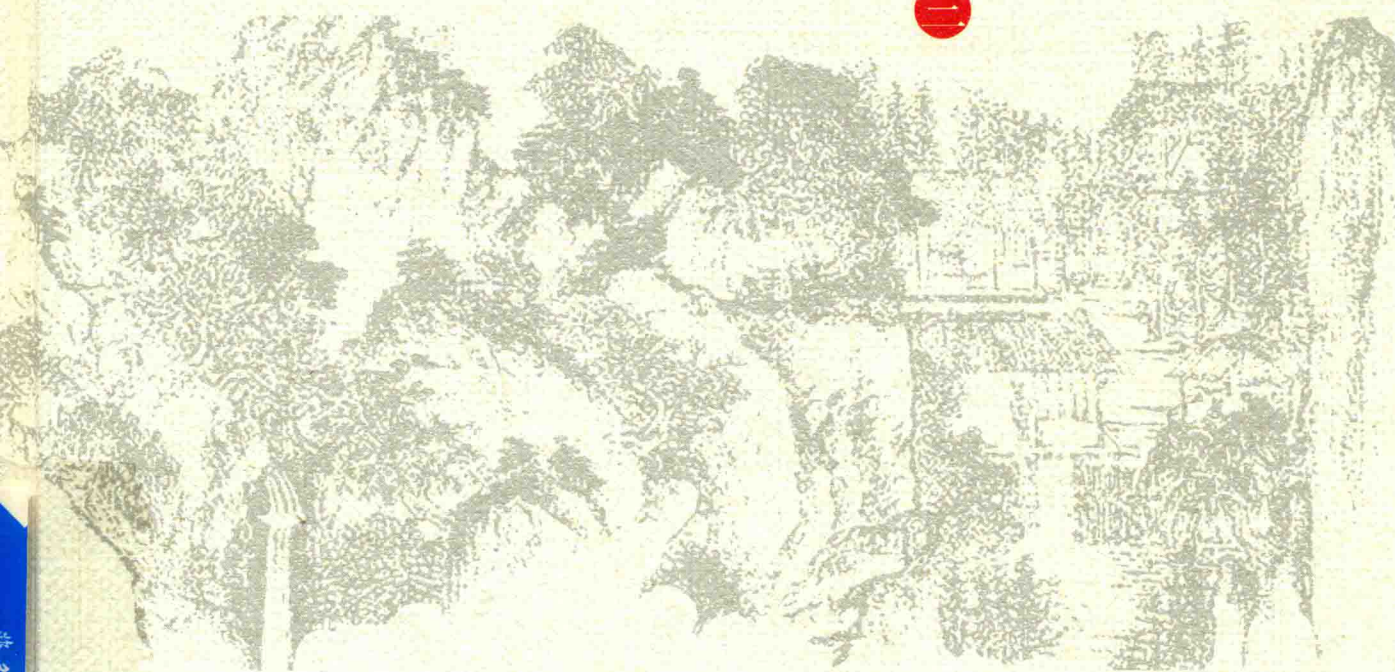
精华集成

第八辑

礼仪法术 卷二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八辑

礼仪法术

卷二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 第八辑, 礼仪法术: 共4卷 /
詹石窗总主编.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39-7229-2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51 号

选题策划: 张 树

责任编辑: 张 树 苏密娅 杨怡君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八辑《礼仪法术》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29.75 字数 2595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7229-2

定价: 3180.00 元(全 4 册)

[http:// www. sstlp. com](http://www.sstlp.com)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八辑

礼仪法术

卷三

分辑主编◎张泽洪

编校◎焦丽锋

莫江凤

《礼仪法术》卷三·法术概论·占卜讖纬

目 录

术数文化研究

中国术数文化发凡	张明喜 (3)
道教术数与科技哲学	詹石窗 (9)
神权垄断的悖论：中国古代国家对术数活动的限制与两难	
——侧重于兵阴阳学方面	邵 鸿 (12)
论术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何丽野 (21)
从拉兹洛的“意识革命”看故宫秘籍的出版	
——《故宫珍本丛刊·术数类》序	胡孚琛 (26)
论术数对社会生活的模拟	
——以六壬为例	唐希鹏 (31)

神仙方术杂谈

方士与方术	刘厚祜 (39)
方仙道的方术	
——《论方仙道》之二	郑杰文 (46)
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与神仙方术	张 怡 阮荣春 (54)
邹衍的方术思想	齐姜红 (58)
王勃、陈子昂感慨过的问题	
——方术四题之一	李 零 (64)
利玛窦与“三怪兽”	
——方术四题之二	李 零 (68)
先秦两汉小说和古代的神仙方术	柳岳梅 (73)
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讖纬的兴起	潘志峰 (82)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和燕齐方术	马振铎	金佩毅 (87)
论佛教初传与神仙方术的关系	王东江	(92)
神仙方术与百戏的兴起	王廷信	(97)
戏——流行于秦汉时期的方术	朱渊清	(100)
方术与汉代器物设计	许大海	(103)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王 静	梁 勇 (111)

道教法术研究

法术信仰与瑶族神话传说	张劲松	(121)
略论道教的宗旨与方术	赵宗诚	(124)
汉晋解除文与道家方术	连劭名	(131)
论清微派法术与丹功相结合的内炼思想	张 钦	(144)
论道教法术与唐代民间信仰	王永平	(148)
论道教神仙信仰与法术的关系		
——以杜光庭的仙道多途思想为例	孙亦平	(156)
道教法术与岭南巫俗初探	王丽英	(160)
道教法术与戏剧	李 艳	(166)
道教法术——嘯	胥洪泉	(171)
道教观念与法术系统中的巴巫成份分析	桑大鹏	(174)
东晋名士和道术		
——许迈与鲍靓交游考论	马晓坤	(180)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中的道教法术探析	张泽洪	(187)
南唐国道术与唐宋之交的道教衍变	何剑明	(197)
道术：佛教进入中土的法门	刘亚丁	(206)
道教法术“家书式”考	李志鸿	(214)
“承负说”源流考		
——兼论汉魏时期解除“重复”法术	黄景春	(223)

其 他

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王育成	(235)
端公的法术		
——土家族民间信仰研究	雷 翔	(262)
燕齐方术“仙人”形象溯源	杨 军	(270)

从“梦幻”故事看巫术、道术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思想

.....	苟 波 (275)
宋代民间“人祭”之风与密宗的尸身法术.....	刘黎明 (282)
医籍文献中的楚地“巫覡”方术研究.....	冯 春 (290)

占 卜

占卜的源流.....	容肇祖 (299)
论卦爻的年代.....	陆侃如 (327)
易卜的来历.....	陈温桂 (331)
五千年前的八卦和占筮工具.....	许顺湛 (337)
太极、八卦起源新探.....	唐楚臣 (341)
中国占星术初探.....	肖 巍 (350)
八卦起源新探.....	詹石窗 (361)
郭璞易占与道教关系探考.....	连镇标 (368)

讖 纬

讖纬考.....	陈廷杰 (377)
纬史论微自叙.....	姜忠奎 (382)
讖纬说.....	徐卧渔 (384)
讖纬起源及其学说之兴替.....	郑学韬 (387)
讖纬释名.....	陈 槃 (395)
论早期《讖》《纬》及其与邹衍学说之关系.....	陈 槃 (409)
讖纬起源旧说平议.....	陈 槃 (430)
略论“讖”“纬”互辞及讖于经义与纬书之关系.....	陈 槃 (435)
“讖纬之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条件初探.....	李守清 (446)
讖纬神学与宗教及自然科学的关系.....	钟肇鹏 (462)
道教的形成和讖纬思想..... [日] 安居香山著 杨曾文译	(468)
论讖纬的思想归属.....	吕锡琛 (472)
讖纬与阴阳.....	刘晓明 (481)
古代讖言论略.....	丁 鼎 (487)
纬书与政治神话研究.....	冷德熙 (499)
汉代讖纬神学及其对道家宗教文化的影响.....	梁宗华 (505)
论道教拟兆.....	詹石窗 (509)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讖纬流变	余治平 (516)
纬书的构成及其思想渊源研究 [I]	张广保 (524)
纬书的构成及其思想渊源研究 [II]	张广保 (534)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八辑

礼仪法术

卷三

法术概论·占卜讖纬



术数文化
研究

中国术数文化发凡^{*}

张明喜

近年来，在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术数热的流向，术数成为文化研究的课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体现了我国俗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遗憾的是已面世的那些标之以民俗研究的读物，大多停留于作者自己都不知其所以然的术数推演技术的抄袭之上，缺乏对其内部文化机制和文化功能的科学剖析，使读者对这一文化现象更为迷惑，而且亵渎了这一严肃的研究课题。因此，因势利导，正本清源，对这一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做出科学的释说和批判，当为今日文化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中国术数文化概说

所谓术数，指的是推演之术，推往测来，预言个人命运之顺逆，未来之祸福，家族之兴衰，军政之吉凶，社稷之安危，昭示当事人在各自当下的天、地、人三者动态关系发展的最佳制约中，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几乎文化悠久的民族都有一套与自己传统文化相契合的术数文化，中国的术数文化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术数的名称出于后人对春秋以来易卦、阴阳五行学说这类支派旁流的概括，但术数的许多样式则可溯源于上古。

从现有材料看，出现较早的术数样式为“圆梦”。古人奉黄帝为占梦始祖，称其“著有《梦经》十一篇”^①，此说难以实证。但《周礼》注疏说夏、商、周时分别流行“致梦”“觭梦”“咸梦”三术，则并非为荒诞的无稽之谈。这种建立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观念上的占梦术，春秋后经易卦、阴阳五行说的改造，便成了地道的术数别类。

《古史考》称“庖牺氏作卦始有筮，其后殷时巫咸善筮”。《周礼》注疏称颛顼帝时有“玉兆”，尧帝时有“瓦兆”，周时有“原兆”。《尚书》中也有大禹和殷时的占龟记载，可见占卜的久远。这种随机性的占卜方术虽然其“恪遵天命”的原始本意与后来称之为术数的文化底蕴不尽相同，但时人对其象数的释说则有着相对凝固的参照系统，而且这些参照系统愈来愈向易

*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49-53页。

① 《帝王世纪》。

卦、阴阳五行说靠拢，愈来愈与阴阳折衷的天文历数学的发明暗合，甚至其中一些流派直接从易中导出，脱尽了天帝神谕的原始意味，从而它们成了术数中的重要一支。

古人以为天道人事互为影响，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即可以从天文、历谱、候气的常态或变态的组合、交变中测出生存环境、社会人事的各类灾祥事件，于是又从本属自然科学的天文、气象、地理、博物等学科中流变出占候、襍祥、纬等术，它们在周时便已流行，经汉代董仲舒“天人相感”的理论阐发，更为风行，与之相关的五行灾异和讖之部也随之裂变而出。

中国命相之术的源流十分复杂，确切地说，相术产生于奴隶制分崩离析、个人命运意识萌发的春秋时期，它吸取了上古相牛相马之类的农学思想。《诗经·小弁》这首相传为幽王之子宜臼被逐后所写的怨诗中“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一语，勉强透露出了命学观念，但严格意义的命学模式则成型于汉代^①。

阴阳五行说的崛起，使一些方术找到了理论支持，从而上升为一种术数样式，“堪輿”便为一例。“堪”即高处，“輿”即下处，其内容不过选择宅基、墓穴而已。从《诗经》有涉营建的诗来看，其择地时虽参以占龟，但无涉天象、地脉，如从阴阳五行说推演开去，必然会得出地有阴阳向背、死生吉凶的性质，此术因此而生。它肇端于春秋的鲁哀公时，流行于秦汉，其系统学说则为晋时的郭璞所创。

秦汉以来，随“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的社会人事巨变的出现，“望候”中又逸出“望气”一支，即通过察看人的气色，推断其今后品位的方术。由人及事，又演变出“望兵气”的别类，即通过看军营、兵阵的气色，推算战事的方术，此术在兵法中举足轻重，十分流行。

总之，先秦两汉，中国最基本的术数类型均已出现，此后，它们随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而不断旁逸、分蘖、杂交、繁衍，“弥变弥夥”，而蔚为一种足以与其他任何文化样式等量齐观、平分秋色、在世界社会文化层面中极为繁茂的文化群落。

中国术数的分工极为细密，大体可分为七类：

一、预测个人命运的穷通贵贱。主要为相术与命学。此术十分发达，无与伦比，据考有五大体系三十八种。二、预测个人特定人事的吉凶祸福。主要为占龟、易卦、占梦、测字、六壬、遁甲、太乙以及火珠林、梅花数之类的杂占小道，亦不下三十余种。三、预测特定环境的吉凶祸福。主要为相宅、相墓之属，其具体派别也很繁杂。四、预测各类为人所用的器物的吉凶。主要为相印、相笏、占衣、占枕、占灯等等。五、预测从事诸如破土竖梁、婚丧嫁娶、开业出行、行营立寨等活动的时日的吉凶。主要为星历、择日、选择等等。六、预测天灾人祸、水旱饥馑、兵丧治乱等整个社稷民生的吉凶。主要为天文、历谱、占候、风角、襍祥、五行、讖纬、九宫术、推背图等等。七、预测具体的兵事的吉凶。主要为占卜、望气、星占、兵占、六壬、太乙等等。

以上分类，仅就这些术数类别的主要功能而言，有些术数样式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如六壬、遁甲、太乙等，它们既可占算个人未来事件的吉凶，也可占算社会人事的吉凶，而绝不似以上划分的那么单纯明确。

中国术数文化的覆盖地域也大得惊人，它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且随封建帝国的“王化

^① 《泄露的天机——中国相术与命学》上编，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

所被”和历代的中外文化交流，远播到亚洲、欧洲、美洲等世界各地，成为一种至今仍然极为活跃的影响极大的世界性的社会文化样式。因此，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超越时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内部极为隐蔽的元素，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

二、中国术数文化解析

“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①此说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术数文化深邃的内部机制和它们与经学之间深层的文化链接，即“理”“气”“象”“数”这四个重要的文化元素。

理即天地未开之前形而上地决定万物生化的总原理，气即万物所以生成的生命元素，理和气作用的结果便生化出具体的物质形态。理的基本要义为阴阳、动静、气化万物的基本规律。阴阳之气有规律的循环运动反映到自然、人事，便是通过阴阳五行消长生灭的原理生化万物，而这一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的呈现过程便为“象”。气在不同时空中因其阴阳配合的比重、动静、交错的不同而产生一系列精微的质量差别，这就是“数”。数实为万物造化的质量数值和禀气厚薄、顺逆的数据，它决定着万物各自的生存质量形态和有序地循环运动的必然轨迹。能包孕理、气、象、数四元素的即“太极”，也就是被视为宇宙总规律的“道”。

被当代学者普遍疏忽的象和数的文化元素，我们应予特别的重视。先哲以为，客观事物形态的殊异取决于各自禀气的比值，包容于形而上大宇宙的各种不同数值配合的阴阳五行之气随时处于各自的循环运动之中，按照“本标相应”的原理，形而下的各类事物也都与之相关消长，并时刻都在解构着自己。所以，用抽象界定的概念定义无法准确完整地揭示出客观事物活生生的生机内蕴，唯一能揭示认知对象手段的，便是将认知对象的生机抽象为能体现其不同数值配合的动态的阴阳符号。形而上的同一数值的阴阳之气可以生化出种种形而下的互为表里的同类事物，而同类事物的形态或大或小，与认知主体的距离或远或近，其微观的生机命脉的发展轨迹则完全契合一致。所以对活生生的未知对象最完整全面的把握，无过于借助已知的同类事物的生理进行类比，这就是中国古代乏于用抽象的概念和定义来阐明事理，而多用抽象的动态符号和活生生的同类具象以喻理的原因，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

象的载体又有数的规定性，所谓“形由象生，象有数设”“万物不离乎数，而数不离乎奇偶”，为此，又须按阴阳之气的运行轨迹，在整个四季方圆的时空中进行定位分切，以建立起一个形而上的动态的数值坐标系统。先哲在理、气、象、数的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体系。这一宇宙框架又经历代儒、道、医诸学派或从社会人伦，或从自然本体，或从人之生理，或从玄虚的主客体关系等无限拓展和引申，变得更为周密和更具张力，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一统的哲学思想。中国封建社会的诸种文化形态，大多受此影响。术数文化更是直接以此为根柢，它们之间最大差异，不过是对理、气、象、数四个文化元素的取用有所侧重罢了。以术数文化中最为显赫的占卜、堪舆和命相三大家族为例，占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演算宇宙中决定一切社会人事生机命脉气运数值的必然轨迹和通变运数，而对某一偶然事件的绝对制

^① 《四库全书·术数类·提要》。

约,所谓“有数而后吉凶存焉。蓍者,寻数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龟者,启兆之质,非灵照之所生”^①。占卜的精微,主要是或凭借推算天文、律历、候气等的阴阳数度,或考察灼龟、揲蓍之积数,或参伍错综易卦大小之运数,或将占卜对象的律吕四声、字形笔画配合卦数,或以阴阳五行干支奇偶的生剋制化为依据来勾玄出具体人事的理数之顺逆,所以说,因数以观吉凶者,统谓之占卜。当然也有例外,如占卜之属的占候、占物以及相关的纬、谶、襍祥、风角、望气等目,则又侧重于通过考辨具有各种特定理数意味的风云星月等天象和草木鱼虫等物象以测吉凶,即通过“本标相应”的喻体的表象,推算与之理数同类的本体的必然休咎结果,达到“先期以告符命”的前知信息,故可归之为“象数之学”。

堪輿的功能在于荫庇家人,故“气”为这一方术的支点。此术种类虽多,要之,不过是参照五行理气、星卦布局,测定由特定地点与天道、地道的面背朝迎所构成的阴阳之气聚散起止、强弱生死、刚柔动静的凶吉性质,并且通过审辨天运旋转、地运推移与某一山川形势、地理脉络和时空经纬诸要素之间契合而成的气运关合,择出其中最佳的枢纽之点作为房基墓穴,从而达到庇护家人的目的,故此术又被称为“地学理气家之权輿”。

对理、气、象、数四个元素进行全面高扬的是命相之学。此学认为,人之生理即阴阳五行之生理:“人生之道,真精融合,二五凝成,赋其形即赋其理。”^②人实为与大宇宙相应合的小宇宙。大宇宙中万物所具有清朗混浊的机理取决于各自禀气的清浊、厚薄、顺逆,人亦如此。生时得令,禀气清轻者长寿聪敏、富贵荣华;生时失令,禀气晦浊者夭折昏蔽、下贱贫寒。各人具体的命运级差又取决于各自象数的比值。相术中那许多法则,实际都是通过人的外部特征衡量禀气数值,只要将一个人的禀气比值鉴别出来,其一生命运的好坏等差也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说:“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气具焉。”^③星命与相术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以“象”入手来揭示人的命数,而是通过排定当事人人生时所值的年、月、日、时和出生点的特定时空坐标,直接从周流于大宇宙的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轨迹,演绎出他不可抗拒的先天禀性和后天命运,所谓“探天人之赜,原性命之理,穷阴阳象数,知来物吉凶”^④。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中国术数文化实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流衍和畸变,不从哲学的高度鸟瞰术数文化,就无法窥透它们的真相;同样,不解析术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极有特点的文化样式,也很难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全部底蕴和中国古代其他文化形态的品质。

三、中国术数文化批判

中国术数文化的表现形式虽然具有俗文化的鲜明特征,但它们自民间发生后便迅速与雅文化的义理交融,或直接从雅文化中导出,其精神风貌具有浓重的雅文化神韵。

造成术数文化这一独特发展轨迹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格局所致,在以人治

① 《蓍龟论》。

② 《神相全编》

③ 《潜夫论·相列》。

④ 《珞珞子赋注》卷下。

为核心的古代社会，统治阶层自由的幅度总大于被统治者，所以他们个人命运的自觉意识也早于一般民众。术数的信奉者最初主要为统治阶层。其次，与术数的效用相关，其多数种类的作用在于预测有涉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直接服务于统治政权。再次是术数文化自身的性质使然。术数植根易卦、五行说，《易》为“六经”之首，是最核心的儒学经典，阴阳五行说为经学灵魂，为封建社会经世治国的指导思想。术数文化与经典文化思想义理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在封建社会的正统性、合法性和权威性。它们历来都与其他雅文化样式平起平坐而从未受到任何冷落，其发达之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科技、农学等学科。

术数文化的以上特性使它自然流变成为上层社会极为神圣的礼仪习俗。旧时，不仅祭祀、立嗣、农耕、战争等军政大事得参照术数的指令，连择妃、沐浴、求医乃至皇室人员的房事亦唯术数结果而定。统治阶级的文化风貌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术数文化之所以演变为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最大的民间信仰也就不难理解了。毫不夸张地说，术数信仰乃为中国特有的不是宗教但又几乎超越宗教的一种朝野共通的民族信仰。

中国术数文化世俗化的表现形式和经典化的思想义理的二重性，使其成了向世俗社会传播统治阶级思想的宽广桥梁，其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又使它们特有的文化功能得到了极致的释放，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其他文化样式无法起到的深远影响。

在世俗生活中，术数无论是在农桑商贾、讼狱科举，还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不是从当下社会大格局和众人主客观条件的内在联系上讨论问题，而是从“一定不移”的天道对人道的绝对制约来推算结果，将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事业功名的成败得失全归之为风水的好坏、时运的顺逆、禀气的厚薄、命数的盈亏，完全掩盖了旧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窒息了人的灵性才气。尤其是术数将配合在易卦、阴阳五行宇宙图式中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内容，高扬为宇宙精神的天道，对世人的毒害更深。

更严重的是术数的所有类型，不论其具体指向为何，宣扬的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自然命定论思想，即社会人事的变化和个人命运的穷通都决定于阴阳数变的天道，主观努力和抗争在天道命数前毫无作用。这一思想既包涵着三代时天命论的遗传基因，又与儒家倡导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正命”观和道家倡导的“安时而顺处”听天委命、知足常乐的“安命”观契合一致。这种自然命定论的思想经术数文化对世人的潜移默化，在铸成中华民族中那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敢抗争的奴性人格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

从价值观来看，术数文化强调的是轻视独立个体的价值，重视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价值；轻视个人存在形式的价值，重视人格精神的价值；轻视社会功利的价值，重视个人生存的价值。它们以为，个体价值的实现不能超越天道、人事的制约，必须遵循尊卑贵贱的等级原则，服从、顺应三者之间所构成的特定的整体利益，若与天争衡，与人争胜，只会适得其反，导致自我的毁灭和对社会的破坏。所以，人的价值不在于在自由创造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而在于能否恪守自己被天道所决定了的天数，不被超越天数的社会功利所诱惑，在世俗生活中自然地把握自己，不使自己成为利欲的奴隶，安分守己，无条件地顺应命运的安排。中国古代标之为“豁达”的人生最高境界，其实正是这种以牺牲自己的合理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对外界所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安排既无可奈何、不敢抗争，又想自欺欺人、蜷居于自我封闭的虚构的心灵绿洲的一种表现。这种病态的价值观在国民文化心态中的集中反映，就是中华民族中

那种怯卑柔顺，却又能处之泰然，达到精神上超脱自慰的文化个性。这一特有的民族文化心态阴暗面的塑成，实为中国古代强权政治对个体生命绝对规范的结果。

术数文化还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中那种依赖附会类比，注重个体与整体交融互摄、直觉致思的思维模式的形成。术数对其他文化样式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文艺学中“风骨”“气韵”“意象”等重要范畴，种种陈式化、脸谱化的造型法则等与命相说有着一定的血肉联系。中国建筑深受风水说的制约，中医理论中也掺杂着许多命相说、圆梦论，天文学中又渗透着众多星命学的糟粕。术数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渗透几乎是全方位的，不认真剖析术数文化的全部，便无法弄清旧文化的整个内涵；不清算术数文化所产生的许多消极的社会影响，便无法从根本上清除那些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态上的层层污垢，重建国人的精神文明和当代意识。此外，就术数文化的性质来说，当属封建文化的糟粕，但我们也应看到文化现象的复杂性，术数文化能风行至今，除却一定的社会政治原因之外，另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原因，甚至还包含着点滴的科学成分和朦胧的潜科学文化指令。但凡这些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的文化死结，还需要我们人文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齐心协力，做大量的分解和研究工作。

道教术数与科技哲学*

詹石窗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道教术数”嗤之以鼻，把它同科技哲学挂起钩来似乎显得不可思议。这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为了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认识，我们不妨从其含义的发掘入手。

一、“术数”由来与其意义的发明

“术数”这个词汇由来已久。在古代，它曾经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概念。因为它的涵盖面相当广泛，甚至连政治策略、权术也叫作术数。《韩非子·奸劫杀臣》篇说：“夫奸臣得承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① 韩非子在此所谓“术数”，即是就策略上来使用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君王如果不精通政治术数就不能很好地控制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另一方面，古人也把治国的方略叫作“术数”。《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称：晁错“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注谓：“臣瓚曰：‘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对此字义，颜师古予以充分肯定。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术数实际上具有治理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蕴。

当然，古代所谓“术数”更多的则为具体的法术、象数的旨趣。或者说它是古人通过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吉凶、指导生存的学问。懂得术数的人在古代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三国·吴范传》说：“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可见，有术数之道在往昔也算是具备一技之长了。就此意义来讲，术数的类型又是不拘一格的。《汉书·艺文志》列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六种为术数。古代文献中，“术数”或又称之为“数术”。如《汉书·艺文志》在罗列了以上六种类型之后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所谓“羲和”，其名见于《尚书·尧典》。书中称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意思是说，帝尧命令羲和恭谨遵循上天旨意，依日月星辰之运行制定历法，作为时人从事生产活动的根据。这既说明古代曾经设立专门掌管天象的官职，又反映了术

* 本文原载《中国道教》1999年第4期，第19-21页。

①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四，《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